

骆宾基 著



李延禄将军的

回忆

06

——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的报告

K264.306

1

2

B578.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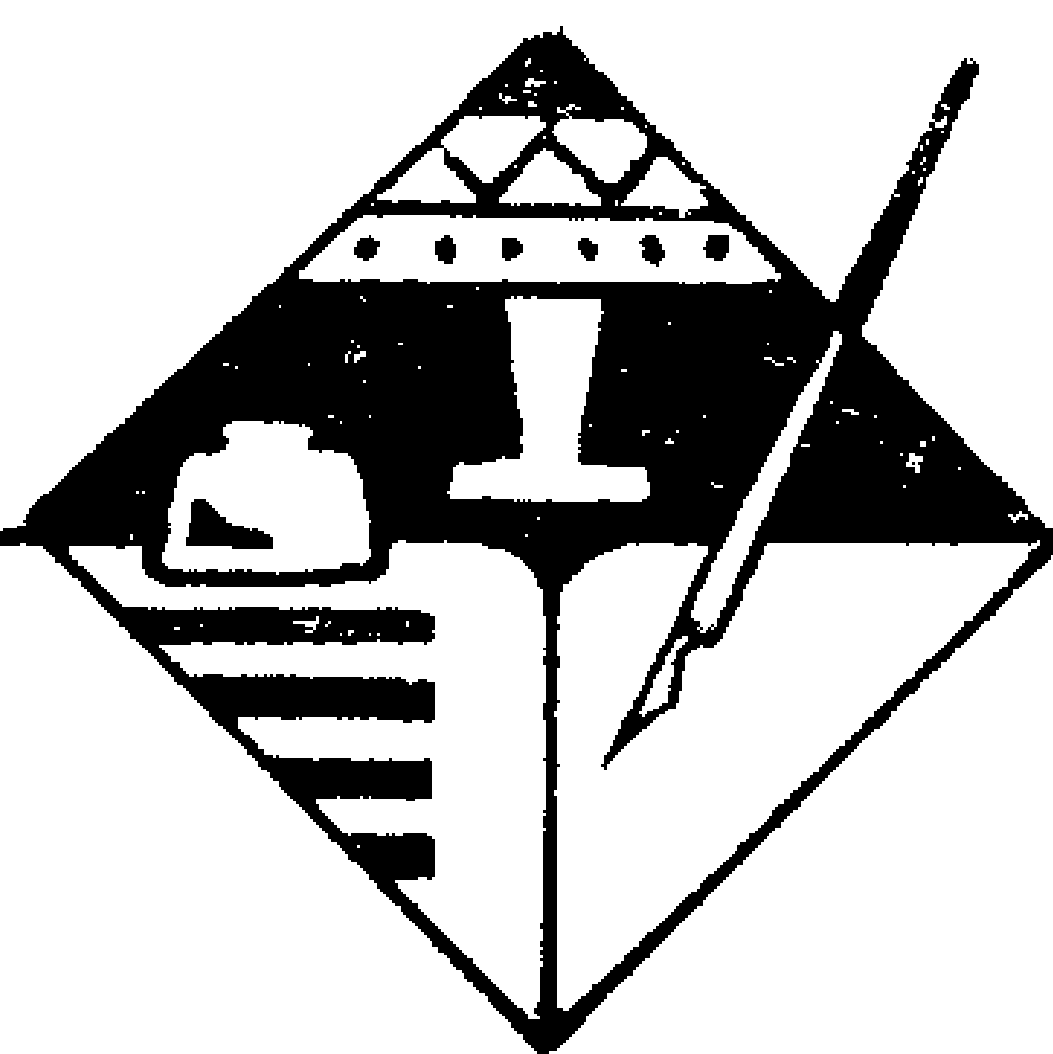
李延禄将军的

回忆

——关于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的报告

骆 宾 基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B

583686



1932年12月27日，李公延禄由穆陵伊林车站出发开赴前方时，与欢送群众告别留影。



1959年秋，李公延禄（右角之首）陪作者（二排中坐者）在黑龙
江宁安县“墙缝”战役遗址拍。作者之右为当年“炮手”李长发。
李公延禄之后，为当年曾在东北抗日联军十三路军任党内机密工
作的关慈，1959年时任牡丹江林业局局长。

改 版 说 明

一、本书原为报告文学，曾以《过去的年代》为书名印行过二十万册，当时征订数为四十万册。

由于主要是向中央作的“总结”性的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的斗争历史经验的报告，因而以个人“我”的自述口气作一线的贯穿，同时又因为内容涉及党内的路线斗争，本未想到能有公之于世的机会。不意原稿经黑龙江省委宣传部初审，认为关于中国共产党吉林延吉县委通过李延禄策动原东北军第十三混成旅所辖属的王德林营升起东北抗日救国军的旗帜，并在中国共产党组织秘密领导下展开震动吉东的“镜泊湖”连环战役而获得歼灭日本板垣师团天野一个旅团的大捷，不涉及党内的政治思想斗争，可以发表。《北方文学》编辑找作者洽谈，仓促之间不及作与向中央“报告”不符的改动；而作者又非“报告”之“我”，因而不得不由作者临时以“李延禄口述骆宾基记录整理”签署，初未料及二十年后该书出版竟被人误为是李延禄“自溢其美”，纯属“吹嘘之辞”，而把作者误为执笔“秘书”，不知本著作纯属作者之纪实性“报告文学”。因此之故，这次把书名改为《李延禄将军的回忆》，并根据李公延禄的记忆又作了微小的修订，交湖南人民出版社再版出书，以明确文责所在。

二、本书的写作，除了对李延禄将军作过六次闲谈式的采访之外，整个“报告”于一九六〇年完稿后，也全部经李公延禄作过审阅，李公对军部行政组织名单、头衔，作战日期之类作过十几处个别订正和补充。这是必须在此一并说明的。

作者在六次采访将军本人的同时，还先后走访过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各个重点战斗遗址。如绥芬河，东宁地区及司令部所在地，宁安地区，镜泊湖，方正、大罗勒密，依兰等处，并都由当地县委宣传部派人协助作过调查与群访。

三、本书的命名曾得李公延禄同意,是在一九八二年夏经将军女公子李晓梅转达而由作者确定的。

最后,谨向湖南人民出版社给予本书修订再版的机会,深致谢忱。

骆宾基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三日

目 录

第一章 疾风知劲草

——东北抗联四军的童年时期……………（1）

第二章 在红旗下奋勇前进

——东北抗联四军的少年时期……………（131）

第三章 化装南行

——东北抗联四军的青年时期（上）……（216）

第四章 北归之后

——东北抗联四军的青年时期（下）……（263）

校后语 ……………（343）

第一章 疾风知劲草

——东北抗联四军的童年时期

—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日寇侵占我东北不久，有日本“敦图线”铁路测量队人员，企图闯入驻延吉的东北军原第十三混成旅第七团三营的防地——瓮声磬子（又名明月沟）。他们不听警告，为值日班长下令击毙七八人，余者鼠窜而逃。日伪当局得讯，反而将三营调往吉林驻防，声言提升三营营长王德林为团长。三营奉命移动，由敦化上火车之后，全体下级官兵闻知将去吉林，顿然变色，忿不受命。王德林在全营官兵抗日要求和敦促之下，拒绝西上，把队伍拉到汪清县境的小城子兵营去，开始酝酿抗日。

九月二十二日，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组织群众抗日的号召，中共延边四县地下中心县委于二十八日召开了紧急

会议。会上，县委书记小李同志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的指示，作出了六项发动抗日斗争的决议，并指派我到王德林部队中去工作，巩固其部队抗日到底的信心和决心，在游击战中建立党的革命武装。因为我和王德林之间，友谊深厚，派我去便于开展工作。这种友谊，还是远在民国七年开始的，由于一种特殊的机缘，我取得了他感恩式的尊重与信任。此外，中心县委会议还决定在我之后，继续派孟泾清、金大伦等四名同志参加王德林部队，去建立党的组织，领导抗日斗争。

我带着党的使命，从延吉到达汪清小城子王德林部队驻扎的营地，不料国民党投降派的盖文华、李耀清、赵冠民等三人代表团，早已捷足先来。

谁都知道，九月二十二日——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我东北的第五天，和我们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抗日号召的同一天，国民党投降派的头目人蒋介石，就在南京市党部召开的会议上宣布了他那遗臭千古的“不抵抗主义”。以盖文华为首的三人代表团，就是受命来此说服王德林及其部队执行国民党“不抵抗主义”卖国政策的。他们给王德林带来了“自卫军第一路军总指挥”的头衔，企图改编王德林的部队，改变其部队的抗日性质，即蒋介石在“告全国国民书”中所说“诉之于国联行政院，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我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王德林在这三个人喋喋不休地鼓噪国民党“不抵抗主义”面前，纸烟一根接着一根地抽，很沉闷，一句话也不说。

当时，国民党政权在一般东北军官中间还有它的迷惑力。这种迷惑力正象密布人民头上的乌云，中国共产党象是被这

乌云所遮蔽的太阳，只有站在一定的地方，感受到从这乌云密布的空隙间透出阳光的人，才能预测到民族所面临的未来的晴空万里的时代。王德林是一般的头脑简单的东北军官，当然也不例外，当时完全为这块当头的乌云所迷惑。此外，在座的还有当时的抗日将领李杜的代表，这个代表带来一万元的军饷支票，要求王德林编为一个团，受李杜调遣，配合作战。两方代表之外，还有来自吉东三个县的以曹梦九为首的所谓士绅代表团，他们和王德林有着封建结盟的关系，嘴头上都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实际上却希望王德林不要“轻举妄动”。在他们看来，王德林如果是“识时务之俊杰”，就该“静伺机宜”，既不联李，也不依蒋，而应该编为“山林警备队”，“自固待机”，“可进可退”。这为的是给王德林部队的未来，开个向日本帝国主义投降的后窗。当时，王德林在这些来自各方的代表群围攻当中，犹疑，沉闷，困惑，不能自解。后来，还有原东北第二十一旅旅长赵芷香，意图抗日，也派来了代表伊晏波。这些来自各方面的代表在围攻王德林的同时，各展唇齿，相互舌战。

我一到，王德林就慨然地说：“你到底来了！”原来，我未到之前，他已经打电话到延吉各处去打听我的行踪了。在大厅里，我见着了来自各方的代表。其中，从吉东三个县份来的那些所谓士绅代表团，我因为东北军的关系大半都认识，不是大地主，就是放高利贷的殷商富户，他们老式穿戴，都挺体面。在我们民族遭受日寇残害、侮辱的时候，看见那只顾劝降的国民党代表，看见这盛装的绅士们，总使人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厌恶情绪。王德林仿佛感到我神色间所现出来的这种情绪，不容我开口，

就说：“庆宾，你先去休息！歇歇再说话。”

这样，我就走开了。直到吃午饭，我们两个人单独见面的时候，王德林才开始谈到来自三方面的代表们所怀的意图，以及军饷一毫莫筹的困窘处境。那些代表们呢？仿佛很怕我们俩有单独密谈的机会，也许很想知道我们谈话的底细，或想观察王德林对我的态度，总之，我们的谈话还没有深入，饭还没有吃，他们就各自离开大厅的餐桌，匆匆忙忙抢先赶来了。这样，我们不得不改变话题，转到一般的关于伪军动态之类的谈话上了。

饭后，我在单独休息中间，接触了王德林周围的官佐及其亲信人物孔宪荣、吴义成等。这两个人都是王德林绿林时代的“底柱子”。当时，孔宪荣在王德林部下任第十连连长，倾向吉东三县所谓绅士代表的意图，意在投机取利，极为狡黠。一九四八年，孔宪荣在出席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所谓“国大代表”会议的时候，认识到自己路末途穷而悬梁自尽了。吴义成和他相反，头脑简单，当时是王德林的悍将，以王德林的意旨为意旨，主张“既已拉出来，就不妨打打试试”。另外两个连长，是汉奸熙洽介绍来的人，根本不会主张抗日。这里主要的抗日力量只能是在基层。

我根据中共延边中心县委的指示，在王德林大营的“兵棚子”里和广大基层士兵接触，先后发现了史忠恒、朴根重、李凤山等班长。他们都是高小毕业生，年轻力壮，满怀爱国热情，积极要求抗日，在他们身上体现出了工农儿女们的优秀的阶级本质。

当天深夜一点，所有那些各式各样的士绅代表都离开王德林归寝去了，只有孔宪荣依恃王之亲信的身份逗留不去。自然，他是要在我们谈话中间，看看他们老营长的手里到底有张什么“底牌”。

王德林终于这样问我了：“你什么都知道了，现在你说吧！我该怎么办？”

我说：“你今年五十几了呀？”

他低沉地说：“五十四了！”

我说：“是呀！你已经五十四岁的人了，难道你还能再活一个五十四岁吗？”

他不说什么。

我说：“在今天，你不站出来当岳武穆，难道你还要当秦桧，给子孙留一个万世的骂名吗？”

他立时忿然地说：“咱们怎么样也不能当秦桧呀！”以后就果断地说：“咱们一定要抗日，绝不能给子孙留下骂名，可是那三个国民党代表怎么处置呀？”

我记得当时孔宪荣说：“抗日也行，可也别说得这么死，和各方面的代表，还得拉着，不能松手，看看大局再说。”

我们没有注意他的话。我建议，把国民党投降派的代表尽快打发走，要抗日救国，就不能留他们在这里扰乱军心，瓦解士气；在内部，还要清除熙洽派来的那两名连长。王德林同意我的意见，又谈到李杜的代表所提出的问题。我说，只要我们对日展开游击战争，队伍很快会扩大的，给李杜编一个团的力量是不算什么的，只要抗日，我们就支持。王德林在谈到我要到“兵

棚子”去扛枪的要求时，坚决不同意，要留我担任他的参谋长，并且兼职将为李杜编制的第一补充团团长。王德林在思想上摆脱开来自国民党三人代表和地方士绅代表双方在政治上的围困之后，心情豁然开朗，提出队伍中缺少知识分子“不能成大事”的问题。我这时候就向他介绍了中共地下中心县委所决定的参加其部队做建党工作的人员名单。他听说孟泾清同志是哈尔滨工大的学生，金大伦是北京大学的学生，都是风云中的杰出人物，就约请孟泾清、刘静安两同志将来任抗日救国军总部之正、副参议长，金大伦、贺剑平两同志将来任总部宣传部正、副部长。

在这天夜里，除掉我们确定打发国民党三人代表和所谓士绅代表们离开部队之外，还初步确定了第一补充团的编制基础。因为，这时候在东北军上层虽然是乌云密布，迷惑犹疑，但在广大的东北人民之间，抗日热情却极度昂扬。当时，杰出的矿工和汉族、朝鲜族起义的农民，以及吉东各县中小学教员等优秀的知识分子，都纷纷来投，王德林正不知怎样安插，现在建立补充团，就正好以这些工农出身的爱国青年为基础确定编制。以后，又调来老三营的史忠恒、朴根重、李凤山等班长为补充团各连连副。这就是我们党用秘密形式所直接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

总之，我们谈的很舒畅。王德林在谈话中，还喝白兰地酒助兴，我虽滴酒不沾，却也兴奋有神，两人直到鸡叫头遍，方感得夜深气寒，下半夜三点才就寝。我倒下之后，仍然久久不能入睡，考虑怎样向地下党委汇报、请示等等问题。

第二天，我开始为王德林的部队筹募经费，以便尽快地遣送国民党三人代表出境。在小城子，有一个电报局副局长，是个有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我曾经和他接触过，知道他拥护抗日。我和他提出经济支援的要求时，他不但把所有敌伪电报局公款两千多元全数捐献，并且表示愿意率领全局爱国职工随军服务。他不久便把自己的家属全都打发回上海，并把所有的通讯设备都带到部队中来了。他为抗日战争作出了很多的贡献，可惜一年以后，由于留在上海的家属需要赡养，他随王德林撤出国境后南返了。总之，我们由于他的支持，有了一点经费，在遣散国民党三人代表时，每人发给路费一百元。当王德林向国民党三人代表团表示了坚决抗日的态度之后，他们竟无耻地挑拨说：“你知道，主张抗日的是共产党！”王德林说：“我不管是共产党、国民党，只要打日本，就是好样的。”实际上他也并不知道共产党是何样人，他说只要打日本就是好样的，不过是表示了对于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激愤。那三个国民党代表，终于悻悻然地离开了。

但是，以延吉县实业局长曹梦九为首的所谓士绅代表团，却依恃和王德林的封建结盟关系，还想无耻地留在部队里说服王德林投降。等到部队向蛤蟆塘（又名双河镇）附近集结的时候，从敦化、蛟河、宁安等县又来了一些商会会长，总之，吉东八个县的所谓士绅代表都菌集在王德林的周围。这时，王德林的抗日救国军已有一千一百多人，声势浩大，有些士绅初来很感吃惊，但以曹梦九为首的那些雍容自得的所谓士绅代表，却全然无动于衷，还在围攻王德林，大言不惭地论山论水，说仁说

智。王德林碍于情面，终于在蛤蟆塘把来自吉东八个县的所有士绅代表们召集到一起，说：“今天，让庆宾和诸位谈谈吧！”并当众介绍我是部队的参谋长。

我当时是个三十三、四岁的青年军官，性体较傲，实在也鄙视这些所谓士绅代表；尤其是这时候我们已经知道，日伪除了派出这些代表之外，还从延吉派出伪警备旅（原混成第十三旅）进驻双河镇作为声援。

所以我当时很气愤，我说：“我们过去都是朋友，可是，今天，我们是抗日救国的军队；你们呢？是亲日的，是汉奸！知道不知道？汉奸就应该绑到外头去枪毙！”

所有那些所谓士绅代表一改雍容自得的姿态，全都惶然失色，悚然地站起来。因为他们完全没想到，我会“变脸不认人”；没想到，在头脑简单的东北军人当中，会有人看出他们藏在背后的尾巴。王德林当时安抚大家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我担保大家的安全就是啦！都坐下，坐下来！”有些大地主和放高利贷的殷商富户，脱下帽子来，惶惶然声辩，说：“参谋长误会了！”

我说：“你们来说服什么呀？给日本人当说客，瓦解我们抗日救国军士气，不是汉奸是什么？你们若真心不当亡国奴，看到我们部队人这样多，财政有困难，为什么不想法给我们募捐呢？”

以敦化县商会会长万茂森为首的几个代表连声说：“我们刚来不久，真没想到咱们的抗日部队这样大，士气又这样高呀！本来，我们也打算给部队募些款，不知道部队经费这样困难。

我们回去以后，一定要办！参谋长，你放心就是啦！”

我说：“这要看事实啦！”另外，我还告诉他们，我的母亲、家属，都还留在敌占区延吉县，如果他们要告密，向日本人请功，就尽管去告密。我说：“要救国的人，就不能顾家，因为大义而全家遭害的人，哪一个朝代都有！”他们都连称：“不敢。”有的说：“那还是人么？”日后，他们确也没有敢告密。但以曹梦九为首的几个汉奸士绅，却接受了日伪颁发给他们的奖章。同时，以万茂森为首的敦化等三个县的商会会长，履行诺言，秘密地为我们募了一大批捐款，并派代表来部队联系，报告敌伪在“县永衡官银钱号”还有大笔“公款”，希望我们很快去攻城，以便把这些款项提出来。从此可以看出，我们城市的工商界人士，只要是树立起了民族正义感的、爱国的，知道我们要果敢地抗日，就会拥护我们。

我们在一九三二年二月间，开始攻打敦化、额穆、蛟河三个县城的军事目的就在这里。而镜泊湖战役，就是由于我们连续攻克这三座县城，获胜之后引起来的。

二

在这里要说清楚的是：打敦化之前，我们做建党工作的领导同志孟涇清来了。并且如我前面所说，他在抗日救国军中取得了正参议长的公开职位。我们很快的在第一补充团里建立了秘密的党支部，孟涇清同志担任支部书记。他中等身材，是一个风度稳健、处事持重的人，马克思列宁主义修养较高。当时，

参加支部工作的还有史忠恒同志和补充连连副朴根重、李凤山，他们都是新党员。在第一次支部会议上，孟泾清同志作了关于发动抗日战争的传达报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这次会议上指出抗日游击战的长期性。他说，日本帝国主义是一个工业国家，“世界列强”之一，想很快就能把他们赶出去的急躁情绪，是要不得的。这就给那些新党员在思想上建立起了持久抗战的基础。以后，我们又缴获了汪清北部和宁安南部的地主自卫队、警察队、保安队等共约六百人的武装，补充团的武器装备有了底子。这时全部抗日救国军，已发展到一千二百挂零了。

一九三二年二月间，我们以第一补充团和吴义成所率领的“老三营”前锋部队，为进攻敦化的两大主力，开始向敦化进军。孔宪荣为了保持自己的实力，带着一部分队伍作“后卫”。

当时，我们的部队虽说已庞大，但纪律严明。那些从老三营调到补充团里的战士，仍然佩戴着肩章、领章，背后扎着豹子皮做的坐垫。军官全穿黄呢质料的军大衣，胸前有双排的铜扣子，只是不戴手套，也摘去了肩章。不管是官佐还是士兵，都戴着抗日救国军的臂章，这是我们的唯一的不同于原来东北军的标志。

距敦化百余里，有个地方名叫小沙滩。那里有个远近闻名的大地主，过去是王德林的拜把子兄弟，家里开着“烧锅”，名叫戴凤龄。戴家全户将近百十口人，都住在村当中，院落很大，四围有炮台，还养着一二百名炮手。全村的村民，都是戴家的佃户。

我们部队路过小沙滩，戴凤龄就命令手下人，杀猪宰羊，